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總序

洪惟仁

最近幾年，由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勃興，母語研究蔚成風氣，許多人爭相編纂字辭典，這實在是可喜的現象。不過編纂辭書是件工程浩大的事業，若非有龐大的資金與人才的配合，要編得好是相當困難的事。我們看許多個人的編者都是耗盡一生心血編成一部字典，還不一定受到學術界的肯定，就知道編字典、尤其是台語字典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可是怎樣才是優秀的字典呢？

好辭書八項標準

筆者以為評斷辭書的好壞有如下的標準：

一、目標性：一般說來，編辭書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用，也就是為了服務使用者。但一部辭書若要服務所有讀者，那就變成非常龐大而失去實用價值。所以編辭書首先要確定服務對象，比如一部學生字典，目標若是幫助初學者認漢字、定讀音，就不需要把僻字、方言都放進去；現代口語辭典目的在幫助現代人學習現代口語，那就無須把古語、專業用語統統搬進字典裡頭。若是服務對象無法確定，一部小字典却要包羅萬象，把所知的統統放進字典，一定會弄得雜亂無章，對任何對象都不能達到服務的目的。這就是一部不好的字典。

二、時代性：辭書是有時代性的，現代口語辭典對現代人而言是現代口語，但語言是會變的，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所謂現代口語辭典就變成古語辭典了。現代人無論要編現代口語辭典或古語辭典，必須先把時代確定下來，若是混亂了時代層次，自然就是不好的辭典。

三、地理性：辭書有其地理性，編字典必須先確定方言範圍。方言越純粹的，讀音越確定，但字典的

適用地區越小。若要擴大適用地區，必須把許多不同的方言都放到字典裡頭。無論何種字典，必須注明方言適用範圍，假定注明是「廈門話辭典」，必須真正反映廈門方言的純粹性，若要兼收其他方言異讀，那就必須注明是何處的方言，否則就不能算是好的辭典。

四、周全性：所謂周全性包含兩個意義。一是收辭的周全，比如標榜現代口語辭典，當然是收錄口語辭彙越齊全越好，一部收辭豐富的辭典可以反映當代完整的社會文化，當然具有高度的文獻價值。比如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一八七三：廈門），我們知道它收錄十九世紀中葉的廈門口語非常齊全，因此我們不但根據這部字典知道當時沒有什麼文化與語言，同時也相信當時沒有什麼文化或語言。舉例來說，杜典裏不收「校」字，也不收「學校」一辭，到了甘為霖編《廈門音新字典》（一九一三：台南）才收入「校」字，仍沒有「學校」一詞。但巴克禮作《廈英大辭典補編》（一九二三：台南）時，「學校」一辭同時出現在「學」、「校」二字的第一個辭例。我們知道閩南語過去稱舊式學堂叫「學仔」或「學堂」，日本領台那年才在台灣設立「國語學校」。由此可知，至少在台灣，「學校」一辭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傳入時間是一八九五年。我們為什麼敢這麼確定呢？這必須歸功於前述這些字典反映了當代口語，更因為我們相信杜典是一部周全性相當高的口語辭典，像「學校」這樣重要的辭彙，不可能不收錄。如果是一本收辭不周全的「辭彙集」，我們就不敢做這樣大膽的肯定了。辭典的大小不是問題，但在編者標榜的收錄範圍內，收辭越周全當然是越好的辭典，反之便是差的辭典。

二是解釋的周全。最簡單的辭條解釋是只有對譯辭，但對譯辭對辭條意義無法提供充份的訊息。基本上，兩個語言的辭彙的意義是無法翻譯的。爲了增加讀者的了解，應該多提供一些訊息。比如較詳細的解釋、詞性、例詞或例句、詞色（感情色彩）、語源、方言異讀、相反辭、相似辭……等，提供的訊息越周全，當然越好。

五、寫實性：辭典是否反映現實是評斷辭典好壞的重要標準。中國是一個口語辭典貧乏的國家。中國辭書編纂的歷史雖長，但都是書面語辭典，完整的口語辭典至今都還鳳毛麟角。這和中國雅言中心主義輕視民間活文化的傳統有關。閩南語的辭典，若是外國人編的比較偏重於口語，甚至完全口語，但中國人編的字典往往收入大量漢文辭彙，而口語辭東缺西漏。但也不盡然，比如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一八三七）、

施萊赫《荷華文語類彙》（一八八二—一八九〇）都以文讀音為主，最可笑的是把白話辭注上文讀音，而那些音讀從來不會在實際語言發生過。所以像這些書，雖然部頭很大，但是價值性就比較低。這些字典大多受到漢字的束縛使然，能夠擺脫漢字束縛、反映實際語言的都是最有價值的辭典，如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小川尚義的《台日大辭典》（一九三一—一九三二）。閩南語辭典裏頭，也有少數例子，收錄了一些異讀，但那個音讀不是實際語言的紀錄，而是編者推想出來的。推想的根據，可能是北京音、可能是根據方音對應規則算出來，可能根據古代中國韻書的切語切出來，但實際語言並沒有那個音。比如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一九八二）根據韻書，把「荔」字讀音訂為*li, lian⁷*，又「彙」字訂為*ui⁷*而以*ie⁷*為俗音，其實根據文獻及實際語言的調查，我們知道廈門實際是「荔」文讀*le⁷*、「彙」文讀*ie⁷*，這種以古律今，或以他處方言推算本地方言的做法不一定可取。辭典雖可分紀錄性的及規範性的，但不能以他時他地的標準來規範此時此地的語言。能夠如實反映實際語言的便是好辭典，否則便是差的辭典。

六、代表性：辭書不是個人語言的紀錄，而是社會語言的紀錄。許多人的方言調查只是根據某個發音人的發音加以如實紀錄下來便算了事，但一時一地的許多人之間由於文化背景、職業背景、性別、多語能力等的差異，個人的語言不一定具有代表性。調查對象越多，其紀錄越具代表性。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辭書當然越優秀。

七、使用方便性：一部內容很好的辭書，若是檢閱不便、使得讀者花費很多工夫才能查到自己所要的東西，那就會大大減低它的實用價值。

八、體例統一性：辭典的編排必須要體例統一才不致於造成誤會，比如要以什麼記號代表什麼類別，什麼內容先排、什麼內容後排，都必須要有統一的體例。

以上列舉八個辭典優劣評斷標準，可分三類，列表於下：

- 一、定位：
 1. 目標性
 2. 時代性
 3. 地理性
- 二、內容：
 4. 周全性

5. 寫實性

6. 代表性

三、編排：7. 使用方便性

8. 體例統一性

一部定位確實、內容翔實、編排技術俱佳的辭書，那是相當標準的辭書了。可是這樣標準的辭書却不可多得。

辭書的文獻價值

筆者所知的閩南語辭書約一百部出頭，其中親眼目睹過的約八、九十部。我已經將已出版的、有關漳泉系閩南語辭書整理出《閩南語辭書簡介》一文，文中所介紹的辭書共計六十九種，這些辭典並不是每一部都合乎上述的標準，總是有一些缺失。能夠面面俱到，每一方面都達到相當水準的，我以為只有兩部：即《台日大辭典》（一九三二—三三）及《廈英大辭典》（一八七三）。

不過，並非要達到十分標準才具備歷史文獻的價值，文獻價值往往根據當代文獻的多寡而定，如果某一個時代的語言文獻極為缺乏，那怕只有片言隻字，只要能從那片言隻字探知當代語言特色，那片言隻字就成了非常具有歷史價值的寶貴文獻。清代的韻書便是如此。

閩南語羅馬字文獻早在十七世紀初期便由一批天主教羅明教教會的教士們留下一些傳教文字，並且聽說有一部字典，可惜筆者未見，筆者所見最早的一部字典是由基督教新教派英國倫敦會牧師麥都思所編的《福建方言字典》（一八三七年出版），但以杜嘉德原著及巴克禮增補（一九二三）的《廈英大辭典》算是最高峯，但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一批閩南人，根據他們的母語，運用漢語聲韻學上具登峰造極成就的三字反切法創作了一系列的閩南語韻書。中國的學者早在隋代以前就編了許多「韻書」，他們所用的標音工具是二字反切法。這種二字反切法的切語沒有固定用字，韻書編法也不能反映音系結構，宋代才產生了所謂「韻圖」以補其不足。再者，這些韻書所反映的是一種理想而抽象的音系，並未能反應實際語言。元代才產生了一種為方便伶人認字正音而設計的北方韻書，編方言韻書的風氣傳到南方，明末福州就出現了一種地方韻

書，不但用固定的三字切音，而且所有切字均有固定音序，儼然是一種拼音字母，又結合韻書與韻圖的雙重編排技術製成福州的《戚林八音》。

一八〇〇年泉州人黃謙模做福州韻書編成一本能夠反映泉州音系、以便農工商賈識字之用的泉州韻書《彙音妙悟》，然後廖綸璣（可能在清末）編成了《拍掌知音》的泉州文讀音韻圖。這兩本書的品質雖然不怎麼高，但《彙音妙悟》却是第一部閩南語辭書，具有劃時代的文獻價值，在它出現之前的閩南語語音史是史前史，它出現之後才進入有史時代。《拍掌知音》是一本確定泉州文讀音系統的韻圖，除了這兩本之外，我們也找不到其他足以反映清代泉州音的文獻，因此它們的文獻價值，無疑地非常高了。

同時漳州也出現了一種方言韻書，通稱為十五音。通常認為最早的一本十五音是一八一八年出版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著者是謝秀嵐。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一本「十五音」遠比一八一八年為早。

一八二〇年漳州又出現了一部所謂《增補彙音》，版本極多，或稱《珠字十五音》、《烏字十五音》，這是只收文讀韻的《十五音》節錄本。

大約是清末，出現了一種不具撰者姓名的《渡江書十五音》，還有一些筆者未見的所謂「手抄十五音」之類韻書。一連串的漳州韻書紀錄了漳州語音的發展軌跡與方言，但都不是好的辭書。

這些韻書著作的目的只是為了服務農工商賈「因音求字」的識字、找字之需，往往品質不高。加上書商輾轉翻刻謀利，致使訛誤之處比比皆是。然而從漳州語音史的觀點來看，它們的文獻價值是很高的。

台灣也有一些十五音，品質都不怎麼高，但編排技術頗有精進，並加注羅馬字，也頗能反應一時一地的方言，因此也相當具有文獻價值。其中最優秀的應數沈富進的《彙音寶鑑》（一九五四）。

絕版的閩南語辭書

許多人以為閩南語沒有字典，其實閩南語不止有字典，而且字典非常多，我雖然沒有統計的根據，但我猜想，除了漢文辭書、現代中文辭書之外，恐怕沒有那一個漢語方言有這麼豐富而且品質優秀的方言辭書了。筆者所見或雖未見而有論文介紹的正式出版的辭書，在《閩南語辭書簡介》一文中所介紹的就有七十餘部之多，筆者所未見的，又不知凡幾。又該文所介紹的還只是漳泉系方言辭書，若包括潮州、海南

島、雷州半島的方言辭書，不知道會有多少。

然而可惜的是，絕大部份的辭書都已絕版，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二孤本，散藏於各地圖書館或私人藏書家。筆者非常幸運地能夠收藏到或目睹到其中大部份辭書，及全部品質優秀的傑作。筆者曾經奢想把全世界蒐集來的閩南語絕版辭書編成「全集」翻印出版，可是沒有一家出版商有這股傻勁。

兩年半前，武陵出版社老闆林聰富先生聽我談起彙編閩南語辭書的事，非常有興趣。這次我不敢提「全集」的事，我說我想編一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從所有閩南語辭書中精選具高度文獻價值的作品彙為一編，這個彙編所收錄的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

一、具有追溯台灣閩南語的源流，呈現閩南語從唐山過台灣的發展軌跡的經典之作。

二、絕版，無版權或可獲得版權的著作。

選定之後，由筆者為每一部辭書寫一篇解題，這篇解題必須有如下的內容：

一、本書字母音讀對照表。

二、本書編者傳記。

三、本書編者年表。

四、本書在閩南語史上的文獻價值。

五、本書在閩南語辭書史上的地位。

我說我不需要什麼報酬，只要送給我幾套《彙編》即可。

林先生聽了我的計劃之後，立即爽快地答應出版二百套。我預料這樣一部冷門過時的辭書再加上長篇解題的高難度排版可能帶來虧損，但林先生說：「我在其他的書上已經賺到錢，為這套書賠一點也無所謂，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出版。」於是立刻與我簽下合同。

十四種經典辭書

我根據前面的原則，精選了十三部、十四種閩南語經典辭書：

1. 黃謙《彙音妙悟》（一八〇〇年、泉州話韻書，道光本）

2. 黃謙《彙音妙悟》(同前,集新堂本)
 3. 廖綸璣《拍掌知音》(清末?泉州文讀音韻圖)
 4. 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八一八年漳州話韻書)
 5. 壺麓主人?《增補彙音》(一八二〇年漳州文讀音韻書)
 6. 無名氏《渡江書十五音》(清末?漳州東部韻書)
 7.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一八三七年漳浦音羅馬字標音漳州話字典)
 8.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一八七三年、廈門音兼收漳泉各地方音羅馬字標音閩南話辭典)
 9. 巴克禮《廈英大辭典補編》(一九二三年、廈門音羅馬字標音台灣話辭典)
 10. 台灣總督府《日臺大辭典》(一九〇七年、廈門音假名標音台灣話辭典)
 11. 台灣總督府《臺日大辭典》(一九三一—三二年、廈門音兼收漳泉各地方音假名標音台灣話辭典)
 12. 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語彙》(一九五七年、台南音羅馬字標音台灣話辭典)
 13. 黃有實《台灣十五音辭典》(一九七二年、加注羅馬字台灣話韻書)
- 這個書目是根據上列八項評選標準,兩個收錄原則所精選的。由這個書目可以看出,雖然不是每一部都非常合乎標準,但一定是可以代表某個時代、某個方言,原版可得、版權可得的絕版書中,最優秀的作品。

有機組合的辭書彙編

就整部彙編而言,我們也是根據上列八標準、兩原則把所有的收錄辭書作有機的組合,並不是無機的湊合。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把各時代、各地域的經典辭書,結合成一部能夠反映兩百年來由泉州、漳州、廈門、到台灣的整個語音、語彙乃至語法的發展史的完整的文獻史料。換言之,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研究台灣閩南語發展史的學者。上面的書目中,有五部台灣話辭書、一部以廈門話為主的閩南話辭書(杜典)、

有四部漳州話辭書，兩部三種泉州話辭書，但沒有一部潮州話辭書。潮州話雖然也是一種閩南語方言，潮語辭書也不少，但潮州話對台灣話幾乎毫無影響力，所以我們無法加以收錄，而漳泉話是台灣話的源流，其辭書不能不收錄。

從內容來看，十三部辭書的代表方言，含蓋了漳、泉、廈、台灣，每一個方言都有相當周全性的辭書收錄在內，所以整個《彙編》也就相當具有周全性。唯一較弱的是泉州話。泉州話是最重要的閩南語方言，但是至今尚未見到一部較完整的泉州話辭典，只有不太完整的韻書或韻圖，這是歷史事實，我們也無可如何。爲了補足善本的不足，本編收錄了兩種版本的《彙音妙悟》供讀者參考。

在編排上，要把內容龐雜、種類不一的十四部辭書編成一部具使用方便性、體例統一性的《彙編》，這是我做爲本編的編者份內的工作。我計劃撰寫的解題內容綱要，就是爲了達成這個目標。

說來容易做來難

可是實際上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原因是：

一、我雖見過所有的經典之作，但並非每部書都收藏在手上，即使收藏的也可能只是影印本，或者是殘本。我怎樣去得到原本或全本呢？

二、雖然所有經典辭書的編者都已過世了，但其版權尚有繼承人，我怎樣和那繼承人連絡上呢？

三、寫傳記不是易事，語言學界關心文獻的已經是鳳毛麟角，爲字典寫傳記的更是寥逾晨星。我哪裏去找資料呢？

四、要了解本書在閩南語史上的文獻價值及其在閩南語辭書史上的地位，必須讀遍所有重要的閩南語文獻及相關研究論文，我的資料夠嗎？

五、無論韻書或任何音標，所用的符號既非國際音標，如果時地差得太遠，我們便很難了解符號所代表的音值。譬如二百年前的那部泉州韻書《彙音妙悟》，現在已經沒有一個方言符合那個古代的泉州音系了，如果我們要製作一張《彙音妙悟音讀對照表》，勢必要經過繁複的考據，如果這個考據要具有十分的說服力，就必要有豐富的文獻、方言資料及歷史語言學的素養。我有足夠的資料和能力嗎？

六、蒐集絕版書是件困難的事，蒐集研究資料、並加以比較、判斷更是難中之難。那不但需要相當的學養，更需要相當的時間，我有那麼多餘暇嗎？

得到學問上的良師

就在那個時候（一九八九年五月），在龔煌城先生的提拔下，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聘為助理研究員。直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底正好兩年三個月。這兩年約聘時間不但使我生活無虞，可以專心研究，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利用傅斯年圖書館的藏書。前面所提到的生活問題與資料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了。

這個機會同時也提供給我一個切磋學習的機會。在語言學方面，史語所語言組主任龔煌城先生與史語所所長丁邦新先生都曾給我指導過。龔先生在生活中對我照顧得像子弟一般，但在學問上却毫不通融。他是國際知名的漢藏比較語言學者，他的治學態度極為嚴謹。他的文章不多，但是他每寫成一篇文章，就為漢藏比較語言學推進一步。他看我的論文非常仔細，每每耳提面命似地為我的論文提出毫不客氣的指正，並提供我參考書目。他是繼鍾露昇老師之後，真正的恩師。鍾老師引我入語言學大門，龔老師則引我登堂入室，如果我為本《彙編》所寫的解題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第一個應該歸功於他。

丁先生也是國際知名的漢語學者，寫過幾篇有深度的閩語學文章。但他的政治思想保守，一九八七年底曾寫過一篇〈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抨擊台灣民主運動、台語運動，引起很大的波瀾。我也湊著從語言學的觀點寫了〈入境隨俗、落地生根〉提出嚴厲的反駁。事後丁先生約我「溝通」，雖然沒什麼結論，總算進一步了解了彼此的立場與觀點。這正應了所謂「不打不相識」的老諺語。

在〈入境隨俗、落地生根〉一文中，我比較了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的台語研究之熱心與戰後中央研究院對台語研究的冷漠，說：「中央研究院遷台四十年，吃台灣米不研究台灣話」，這是事實。龔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十分贊同，有一天告訴我：「我想申請一個『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劃』，想請你來當專任助理，你願意嗎？」我說：「當然願意。」那時我正隱居於石碇的深山中。我不太記得怎麼認識龔先生的，只記得大約一九八六年以前我們就認識了，那時我住金山，我常打電話給龔先生、向他請教或發表一些謬見，他也看過我寫的論文，知道我做過許多台灣話的調查研究。他見我無業，一度要介紹我到大學教書，我說：

「教書太浪費時間，不如在家做研究」，婉拒了他的好意。但是現在既然他自己要申請計劃讓我去研究自己想研究的東西，豈有不願意之理？但是研究助理的地位很低，龔先生怕我嫌棄，安慰我說：「名稱雖是助理，其實是請你來研究。」

但是這個計劃必須經過了所長的批准。了所長會不會藉機反對、報一箭之仇呢？令人意外的是了先生只對龔先生說了一句：「你這是為洪惟仁申請的嘛！」也就同意了。一九八八年四月我開始成為龔先生主持下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劃」的研究助理，一面進行方言調查，一面進行閩南語辭書研究。我寫了十萬字的〈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影印了好幾本請人指教，多半沒有回音，感謝了先生和師大姚榮松教授在百忙中為我細讀一過，並加眉批，提出一些指正與建議，使我避免了一些錯誤。這本書的部份內容收在《彙編》第一冊的解題裏。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曹永和先生也是我的好導師。如前所述，有關閩南語辭書的作者幾乎沒有人作過深入研究。台語學界，我所尊敬的文獻學者只有二位，一是台大吳守禮教授，一是日本天理大學的村上嘉英教授。但吳教授在美、村上教授在日，無法親聆賜教。當我要為《福建方言字典》的作者Medhurst、《廈英大辭典》的作者Douglas、其補編的作者Barclay立傳時，我的手上毫無資料，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漢名。譬如Medhurst，吳守禮教授譯為「麥得哈」，我感到那是由日譯名メドハースト轉譯的，不如直接由英文按漢字台語音譯為「蔑核氏」為佳。後來我為了寫傳，跑去請教曹永和教授，曹先生是近代東西交流史的權威，他一聽Medhurst的大名便知道是那位曾經編過閩南語字典的基督新教傳教士，指引我如何找資料。於是我才明白Medhurst有他自己的漢名「麥都思」，原來他是基督新教東傳的開拓者之一，是馬禮遜手下最得力的助手。後來我寫杜嘉德傳、巴克禮傳，都曾經得到曹先生的指引。

閩南語方言比較

關於解讀反切字母或拼音字母，閩南語前輩學者其實有人做過，但是眾說紛紜，並且無非是猜測之詞，誰也沒有舉過什麼科學的證據，我們相信誰的呢？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感到必須仔細檢索一下歷史文獻紀錄，更重要的是得到現代方言資料，運用比較

構擬法，加以重建。於是我努力研讀文獻，蒐集現代方言資料，而最重要的是自己親手作方言調查。

我做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已經有將近十年的歷史，我走遍了整個台灣，調查了二百多個方言點，我所蒐集到的台灣方言調查資料，加上福建學者所發表的閩南方言資料，以及我所研讀的閩南語歷史文獻，足夠供我運用比較構擬法，擬定所有閩南語辭書的字母或音標的音讀。

解決了生活上以及研究上的問題，剩下來便只是如何取得原本或全本，以及版權了。非常幸運地，經過這兩三年的努力，我們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非常感謝杜建坊先生提供道光本《彙音妙悟》、《增補彙音》、《福建方言字典》殘本、蔡哲茂先生提供集新堂本《彙音妙悟》，中島幹起教授贈送《渡江書十五音》，無名氏借印《廈英大辭典》及補編、原版《臺日大辭典》、《日台大辭典》。

感謝樋口靖教授跑了三趟東洋文庫，補全了《福建方言字典》殘缺或模糊的部份。

感謝王育德夫人王林雪梅女士慷慨借用《台灣語常用語彙》原版及其版權，並提供王育德先生資料。

感謝黃有實先生長公子黃茂松先生借用《台灣十五音辭典》原版及其版權，並提供黃有實先生資料。還有，提供協助蒐集研究資料的傅斯年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工作人員、私人藏書家、合作發音人都是我編著本《彙編》的功勞者，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大名，讓我在此一并向他們致最深的謝忱。

洪惟仁序于南港中研院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